

当 / 代 / 世 / 界 / 文 / 豪 / 书 / 系

巨匠丛书



顶风破浪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4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巨匠丛书

顶风破浪

MARIO VARGAS LLOSA

略萨全集

42

[秘—西]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 著

赵德明 / 主编

赵德明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编译者的话

这部巴尔加斯·略萨的散文集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顶风破浪》，原书有三大卷，总共 1359 页，如果翻译成中文，大约会达到 112 万个汉字。考虑到略萨是个文学家，还是多了解他的文学思想为好，所以除个别篇幅反映他某个时期的政治态度之外，百分之九十的文章都选了他的文学散文。第二部分是《世界名著评述》，原书有 25 篇，这里选了 10 篇。这样选择的原因之一是这 10 篇的评论对象可能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世界名著，看看巴尔加斯·略萨的点评会有这样的好处：一是看看自己的欣赏角度与当代西方文坛的大作家有什么区别；二是可以了解巴尔加斯·略萨为什么用这样的标准和方法评论世界名著。

第一部分文章的时间跨度是从 1962 年到 1990 年。在这近 30 年的人生历程中，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50—60 年代，他相信文学应该对党派有所承诺，文学应该成为与军事独裁、反动政客和宗教迷信斗争的武器；6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叶，他从笃信萨特的存在主义转向怀疑主义；进入 80



年代以后,他举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根据 90 年代以来他出版的长篇小说《继母颂》和《情爱笔记》来看,如今作者显然更重视文学自身的特征了:文学的承诺已经从党派和社会转向了文学本身。通过入选的 25 篇散文,我们可以发觉这 30 年全球社会、文化、经济、科技、政治(尤其是两大阵营的解体,多元意识形态的出现)在略萨文章中的反映,例如,他从崇拜萨特到疏远这位存在主义的大师的思想变化就清楚地表现在字里行间。时代在前进,社会生活在变化,作家的思想也在不断地更新和调整,这都在情理之中。但并非每个作家都能以真诚的态度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对待社会变化和自己。比如,萨特在文学问题上说过许多错话,他时而要文学对社会有所承诺,又时而说文学苍白无用,这使得不少文学青年无所适从。可是,巴尔加斯·略萨说:“还从来没有人对萨特采取这样或者那样的思想立场时所怀着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和光明磊落的态度提出置疑。”这话自然而然地让我们想起另外一类文人:他们一贯正确,永远会把握时机,包装自己,沽名钓誉,其目的无非是争名夺利而已。1982 年 8 月巴尔加斯·略萨在为《萨特与加缪》一书作序时态度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忘我的读者在看完这本厚书之后,将会像我一样困惑地发现,书中疑问多于确信,而可以确信的部分是如此地简洁,三言两语即可说清:归根到底,文学比政治重要;虽然每个作家都应该关心政治,但是目的仅仅在于阻拦政治的错误方向,警告政治不得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自由与社会公正是不可分的,凡是以尽快争取社会公正为名义而牺牲别人的自由因此将二者分离的人,都是当代真正的野蛮人。当代知识分子往往出于机会主义、怯懦和丧失良知而成为野蛮政治的帮凶。最后一点:尽管悲观主义似乎比乐观主义更为现实地正视拉丁美洲的明天,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忍辱屈从、举手投降,



而是应该在那两条战线上继续作战,实际上那仅仅是一条战线:反对军事独裁恐怖,反对经济剥削,反对失业造成的饥饿政策,反对警察和特务的刑讯逼供,反对官方的愚昧宣传,反对一党专政,反对新闻、报刊的检查制度,反对任何性质的恐怖活动,反对任何僵化和教条的思想,反对用历史的局限性做借口为某些过去的罪责开脱,反对以国家的名义强奸民意。”

第二部分《世界名著评述》写于1987—1988年,着重分析了1911—1964年期间出现的世界名著,例如:《黛洛维夫人》、《洛丽塔》、《圣殿》、《局外人》、《在威尼斯之死》、《曼哈顿中转站》、《铁皮鼓》、《都柏林人》、《日瓦戈医生》等。作者撰写这些评论文章的主旨似乎表现在下面这段话里:“小说是社会发生某种信仰危机时的艺术,由于社会总需要信仰某种东西,原来那统一的、可信赖的、绝对的概念已经被一种出现裂痕的概念所替代,被一种对现世和来世的不断怀疑所替代。除去超道德观之外,小说的骨子里总有一些怀疑论。当宗教文化发生危机时,生活似乎要脱离束缚它的条条框框和观念并且变得混乱起来,这就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小说的人造秩序为读者提供了避风港和安全感;实际生活煽动起来而又得不到满足或者消除的欲望和担心,可以在小说中自由驰骋了。小说是生活的临时代用品。回到现实中去总是一种残忍的贫困化,证实了现实永远不如梦想的美好。换句话说,每当小说暂时平息了人们的不满时,同时也就挑起了人们的不满,刺激了人们的欲望和想象力。”小说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食粮,它有双重性:暂时解除精神饥饿,吃下去又会让产生新的欲望。而从事创作小说的人们则首先需要精神自由和思想独立,否则不可能产生为读者提供自由的避风港。艺术直觉和敏感是文学创作的前提,因此作家往往是怀疑思想教条和发现社会危机的先锋。巴尔加斯·略萨这些观点说明他

到了80年代末期已经完全摆脱了存在主义的束缚，高高地举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时代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安春海先生在策划《巴尔加斯·略萨全集》时大力坚持要编译好一部散文集。现在看来安先生是有战略眼光的，他相信中国读者、尤其是文学爱好者一定会从这个集子中学到在中国文学中不可能学到的东西。在编、译完这个集子的时候，我们感觉安先生是有道理的。衷心希望读者真的能够从中受益。

赵 德 明

北京大学燕北园

1998年12月20日

目 录

编译者的话	(1)
第一部分 顶风破浪	(1)
加缪的修正	(3)
在古巴,被包围的国家里	(9)
古巴革命报道	(13)
纪念哈维尔·赫拉乌德	(19)
萨特与诺贝尔文学奖	(22)
海明威是个喜欢活动的人吗?	(27)
另一些反对萨特的人	(32)
关于《悲惨世界》	(37)
浪女的回归	(42)
《一种非常甜蜜的死》	(47)
关于金·汉森事件的思考	(51)
一种神话、一本书和一个社会阶层	(60)
加缪与文学	(60)
文学是一团火	(65)
文学与流亡	(71)
乔治·巴塔耶或者拯救邪恶	(76)
致国际笔会的信	(99)

二十年后的萨特	(101)
精神长官	(105)
《萨特与加缪》序	(120)
自由的文化	(125)
卡夫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144)
博尔赫斯的虚构	(149)
自由和恐惧	(164)
我的儿子,埃塞俄比亚人	(178)
第二部分 世界名著评述	(205)
平庸中紧张和豪华的生活:评《黛洛维夫人》	(207)
洛丽塔已过 30 岁:评《洛丽塔》	(215)
藏污纳垢之所:评《圣殿》	(224)
局外人该死:评《局外人》	(233)
深渊的召唤:评《在威尼斯之死》	(241)
群像资本与毁灭:评《曼哈顿中转站》	(249)
鼓声咚咚:评《铁皮鼓》	(257)
赋予平庸的生活以艺术的尊严:评《都柏林人》	(267)
风中烈焰:评《日瓦戈医生》	(276)
谎言中的真实	(285)

第一部分

顶风破浪



加缪的修正

作家赢得大批读者和失去他们的方式是一样的：突然之间。作家和读者的关系总是令人奇怪的，不像是建立在理智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感情和直觉上。这种与爱情相似的关系实在让人惊奇；它突然出现，可即使在关系最亲密的时刻，也有不稳定因素。比如，加缪的例子作何解释？十五年前，他还是法国青年中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而今天却在御用文坛上占据可怜的一席之地，为公众所唾弃，只在官方的教科书中才有地位。

有人认为加缪的跌落是他对阿尔及利亚悲剧的态度所造成的结果。由于一个迫使他在正义事业和少数派之间进行抉择的问题把他打得粉碎（他觉得自己一向与这个少数派密不可分，因为他出生并生活在这群人中间），众所周知，加缪对这个问题选择了时而沉默时而发表模棱两可声明的态度。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充分。读者可能发现作家的某种行为令人讨厌，但是不会因此就疏远他的作品。据我所知，没有人为马尔罗在政治上的倒退开脱，也没有人为患有幻觉症的路易斯－费迪南·塞里诺的反犹主义辩白；但是，二人的长篇小说比任何时候都更动人，每

天都在吸引着更多的读者。加缪问题中引人注目的是人和作品的命运吻合：他和他的作品同时落入无人理睬的境地；现在，无论魔鬼还是好心的上帝都对他和他的作品不感兴趣了。

卡里玛赫特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加缪的《证件》的第一卷，包括一系列可以试图说明这位作家奇特命运的线索和万能钥匙。加缪从少年时起就记日记，里面经常记录下一些写作计划、想法和读书心得。有时他用三言两语勾勒出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日后可以利用的情节。这一卷所包括的时期（1935 - 1942）正是巴尔扎克所说是作家生命期中的紧要关头：22岁至30岁。的确，加缪在这个年龄段里获得了决定性的经验：第一次结婚，加入了共产党，通过了《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的毕业论文，从而获得了大学文凭，环欧洲旅行，当话剧演员和导演，离婚，最终与共产主义决裂，再度结婚，二战爆发时极力参军抵抗纳粹，结果由于健康原因被婉拒，从事新闻工作，创作了《局外人》、《西萨弗斯的神话》、《卡利古拉》、《婚礼》和《牛头怪或者奥兰高地》。

在涉及加缪私生活时，《证件》是十分谨慎的，很少离开思考的层面。当加缪谈及自己的私生活时是非常难为情的；他使用中性、无人称的语气；用抽象思考遮掩任何自传式的忏悔。这本日记丝毫没有表现癖，而许多当代作家则借助这一癖好来掩饰他们创造才能的缺乏。因为加缪不需要使用这种方法，他除去是个完美无缺的叙事高手，还具有不寻常的想象力。“我需要写作，如同我需要游泳一样：因为这是身体的要求。”加缪未发表的小说《幸福之死》中的一个角色如是说。加缪本人的情况也是如此。《证件》设计出一位抒情作家而不是思想家的轮廓、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的轮廓。可能有人会说：“真是胡说八道！加缪恰恰是集虚构创作和严谨行文于一身者。”我认为加缪的崩溃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这个错误的信仰。

的确,在读完《证件》之后,就丝毫没有可怀疑之处了:它的荣誉和名气是栖身在误解之上的。读者把他当成哲学家加以赞美,因为他不是写干巴巴的大学教材,而是运用可以理解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思想,如:小说、戏剧、新闻。引人注意的是,加缪本人急急忙忙地向着他的崇拜者已经落入的陷阱走去,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承认公众为他塑造的这一形象是虚假的。这只要读一读《瑞典的演说》、《致德国友人的信》甚至《反抗的人》,就足以证明加缪的思想是含混和肤浅的:泛泛的议论如同空洞的公式一样多,他提出的问题总是钻进那些死胡同,仿佛犯人在那小小的囚室里不知疲倦地踱步。如果这些作品不是用简洁、明快的句子和静悄悄的形象写成的,那么一定会让读者瞧不起。

实际上,加缪只有在描写那个有时间性的具体现实、即文学天地时,才是深刻和具有独创性的。他笔下的人物有生命,他的小说和戏剧有独创精神,因为通过它们,我们这个时代的星云具有了明确的轮廓,并且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的人类、这个荒谬与痛苦的俘虏。《证件》中塞满了小小的插曲,这是加缪从街谈巷议中搜集起来的,它们暴露了这个出色的叙述者的真面貌。“在电影院里,那个小个子奥尔兰女人看到英雄遇难便失声痛哭起来。她丈夫哀求她安静下来。可是,她啜泣着说道,行啦!你总得让我享受一会儿吧!”很值得把出现在《证件》里《幸福之死》的所有片断都引证出来:精练的对话,没有拖泥带水、死气沉沉的描写,紧张的情节。

但是,加缪艺术精神表现得最为令人心悦诚服的地方是他那印象派的风格。每当他谈起某城的街道、树木、天空、海滩时,一位文体优美的大作家就露面了:行文丰富多彩、充满激情、大



方而威严。只要他一讲大道理,便羞羞答答、结结巴巴;只要创造有血有肉的人物,他就变得冷静而清醒。加缪一联想起大自然或者城市风光时,就变成一位温柔多情的作家。“那个阳光普照的早晨,炎热的街道上挤满了妇女。所有的路口都有人在卖鲜花。还有那面带微笑的少女们的面孔。”最为感动人的是阿尔及利亚的风景,它随时都在书中露面,使用的是那块土地让德拉瓜斯产生灵感而画出的浪漫派之作中的强烈色调,但是被一种潜在的温情减弱了许多。在作者的感觉和使他产生灵感的自然环境之间有着紧张的交流,诗歌常常涌流出来:“只要通常柏树在普罗旺斯和意大利的天空上成为团团阴影,那么这里,在凯塔公墓里,这棵柏树就布满了光芒,金色的阳光使它燃烧起来。仿佛一股金黄色的汁液从它黑色的心脏出发,流向短枝的尽头,经过长长的肥沃大街,流向绿色的树叶。”

但是,需要走得再远一些。在加缪身上,占据优势的不仅有艺术家的气质,而且他的性格、他关心的热点都促使他向严肃、认真、冷酷、无情的艺术精神表现发展:唯美主义。“八月暴风雨的天空。炎热的风。乌云。但是,在东方,有一条蓝色、透明、赏心悦目的带子。不可能注视它。那容貌会刺伤眼睛和心灵。因为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让我们焦躁不安。我们渴望一分钟的永恒年年月月延续。”《证件》证实了从加缪其它作品可以轻易推测出来的内容:加缪在外部世界寻找灵感,而不是像虚构小说家那样在自己的意识中探索;他是个天生的观察家,当他上街时便用现实主义作家兴趣盎然的目光窥视四面八方。对他来说,景色秀丽的伊斯兰公墓、太阳闪烁的光芒以及耀眼的天竺葵是比社会、历史事件还要引人注目的写作素材。他喜欢的景色,按照重要性排列,是这样构成的:天空、水、空气、花朵、树木、房屋、人类。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娇生惯养的



诗人、一个只会把部族贫困居民看做风景素材的诗人，担当起负责政治觉悟领导人的角色。他这样唱道：“聚集在自然群落四周的部族，过着各自的生活。男人身穿白布长衫，他们那敏捷的动作突出在永远湛蓝的天空下面。条条小径的两侧生长着仙人掌、橄榄、角豆、山杨。男人赶着驮有橄榄的毛驴走过。他们长着明亮的眼睛，满面生辉。从人到树，从表情到山峦，生出一种既忧伤又欢乐的允诺。”指责加缪如此精美的散文诗中竟然缺乏人性是毫无用处的：有人会谴责神秘主义的诗人不揭发中世纪的残酷而大谈虔诚的心灵吗？人们把加缪看成另外一种人，他本人是没有过错的；惟一可悲的是由于他传染上了那把他变成思想家的集体错误，他背离了自己的情感，步步登上那徒有其表的高空，矫揉造作地大谈理论问题。

实际上，他一度是个敏锐的艺术家，在有些作品中，他凭着本能记录了当代悲剧中最黑暗、转瞬即逝的侧面。《局外人》是现代最佳小说之一。他善于捕捉现实中的碎片：总的说来，他对细节、环境和人的观察是正确的。“一个人在某个方面聪明，他可能在其它方面是傻瓜。”他在《证件》中这样写道。当他按照直觉和想象写作时，令人拍案叫绝；当他一头扎进纯粹的思考时，就变得平庸无奇了。

“人们可能为生命的‘一般’意义而感到焦虑，而不是生命的具体形式，即为生存的意义而苦恼；因为我们没有能力驾驭生命。但是，我们并不为历史操心，因为人类可以随意摆弄它。”《证件》中这条注释所包含的无可争辩的真理，可以帮助我们区别加缪作品中哪些是有价值的，哪些是无用的。他的全部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戏剧、散文诗——都表现了生命的具体形式，就是说，牢牢地扎根在历史之中。由于他发挥了自己的文学才能，这些作品成为令人钦佩的精神产品。反之，当加缪思考生



存和“一般”意义的生命时，他仅仅是用几乎没有区别的公式把一种僵化的悲观主义陈旧概念表述出来而已。用不着给我们谈“中庸哲学”，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个空洞的字眼后面，隐藏着一种如同这一哲学本身一样陈腐、静观和因循守旧的态度；如果要把它应用到一个具体情况时，它空泛无能的毛病就立刻显露出来。面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加缪所处不幸的两难境地，最好地证明了一种企图将人类从历史提出的戏剧性不断选择的承诺中解放出来的理论只具有纯粹修辞学的意义。

当加缪的读者发现这位思想家、这位伦理学者拿不出任何东西解决一个危机时代的种种矛盾、反而像大家一样地困惑时，他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了。但是，总有一天，真正的加缪、面对世界小心谨慎的散文大家，一定会复活的。到那时，人们一定会按照历来理应如此的方式阅读他的作品，如同阅读福楼拜和纪德那样，而不是阅读狄德罗或者萨特那样。

1962年6月于巴黎



在古巴，被包围的国家里

在古巴被封锁的整个时期——将近一个月——来自这个岛国的零星消息使得公众的反应无法形成概念。秘鲁记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那时正在哈瓦那，现在刚刚回到巴黎，他把他在古巴首都的见闻描述如下：

古巴航空公司的布里塔尼亚号飞机上的乘客，在还没有到达哈瓦那之前就在墨西哥城机场里亲身体验到了美国强加给古巴的封锁味道。在起飞前三小时就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原因。在登机前，墨西哥警察把我们审问了一遍，一个便衣给我们每个人照了相。一位外交官的夫人出于气愤引起一场乱子，因为她不愿意照相；她的丈夫当场抗议道：“我夫人不是战略物资……”

终于，我们上了飞机。在到达哈瓦那之前的45分钟里，两架美国佩剑式战斗机出现在我们的侧翼。夜幕降临以后，他们用强烈的探照灯光照射着我们。只是在飞临哈瓦那机场上空时，他们才飞走。两星期以后，我在离开古巴时，又有两架佩剑式出现在古巴领空，监视我们的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